

ZHONGGUOHUA SHIYU XIA DE
XINQIMENG YUNDONG LUNXI

中国化视阈下的 新启蒙运动论析

庞虎 / 著

 人民出版社

ZHONGGUOHUA SHIYU XIA DE
XINQIMENG YUNDONG LUNXI

中国化视阈下的 新启蒙运动论析

庞虎 /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余 雪

封面设计:姚 菲

版式设计:杜维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化视阈下的新启蒙运动论析 / 庞虎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01-019363-2

I. ①中… II. ①庞… III. ①社会运动-文化事业-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 G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9998 号

中国化视阈下的新启蒙运动论析

ZHONGGUOHUA SHIYU XIA DE XINQIMENG YUNDONG LUNXI

庞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00 千字

ISBN 978-7-01-019363-2

定价: 4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该书由中国博士后科学研究基金特别资助项目（“儒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厦门大学“双一流”重点建设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项目资助出版

序

庞虎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化视阈下的新启蒙运动论析》即将出版，要我写个东西作为序言，我欣然答应。一来，庞虎攻读硕士期间，我是其指导教师，学生邀请，不能推辞；二来，该选题虽然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却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庞虎不但啃下来了这块“硬骨头”，十多年过去了，在这个选题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作为导师，我甚感欣慰。十年间，几易其稿，可谓“十年磨一剑”。2000年，庞虎入陕西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就把“新启蒙运动”研究作为其论文选题，该书正是在其硕士论文修改、补充和完善的基础上成书的。从最初4万字小稿扩充到15万字成书，至今算来，已18个年头，说“十年磨一剑”一点也不为过。十年来，时间的沉淀、思考的深入、学术的坚守，为本书的完成增添了难得的厚重感。本书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研究视角新颖。与以往多从纵向维度研究不同，本书以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以1936—1939年为时间段限，把新启蒙运动放到中国化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史的大背景中进行全面考察，形成了历史、思想和现实相统一的“三位一体”研究格局。深入探讨了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内在逻辑，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这样研究的好处是，既避免就“新启蒙运动”谈“新启蒙运动”，

又可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渊源进行深入挖掘,从而为进一步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提供了扎实的学理支撑。本书的研究还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边界的延伸。

第二,研究颇有深度。本书分析客观,有理有据,论从史出,结论公允。首先,研究的系统性。目前学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研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水平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但对新启蒙运动进行系统性和整体性学术研究的专著成果并不多见,本书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其次,研究的创新性。本书着重挖掘了新启蒙运动所蕴含的丰富思想资源和历史资源,如思想文化上的爱国主义、自由民主、新文化建设等。对新启蒙运动的历史成因作了较好的思想史评析,廓清了新启蒙运动的历史脉络,把其发展过程分为“倡导期”、“发展期”、“高潮期”、“收尾期”四个阶段,自成一家之言。尝试构建了“中国化启蒙”和“中国化运行”两大体系,其中“中国化依据论”、“中国化根基论”、“中国化主体论”、“中国化方法论”、“中国化途径论”、“中国化目标论”是“中国化启蒙体系”的理论框架等,上述概括和评析,让人耳目一新。最后,研究的立体性。既有对新启蒙运动总问题的研究,又有典型个案的研究,既有思想史的分析,又有理论史的探讨,揭示了新启蒙运动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性及其与中国化思潮的立体性,如认为新启蒙运动不仅仅是对中国化思潮的延续,更是对其理论的升华,不仅在启蒙根基、启蒙主体、启蒙途径、启蒙目标上,而且在领导体系、动力机制、评价标准等方面,都实现了历史的超越。

第三,学术规范较好。具有创新性的学术成果大都离不开扎实的文献史料和规范的学术要求。本书以第一手资料为主,史料占有全面、翔实,几乎穷尽了有关新启蒙运动发起者和研究者的主要文献,在史料观点的引用上符合规范。在研究方法方面力求创新,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的方法为主，辅之历史学、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第四，该书仍有不足之处，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如最后一章，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践行路径上，能否用“质”、“量”、“度”三个维度来阐述，值得商榷。此外，陈伯达不仅是新启蒙运动的重要倡导者，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重要提出者，他在新启蒙运动中的地位及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构建的贡献也需要进一步展开。

总体来说，本书选题有新意，观点有创新，论证有逻辑，结论有支撑，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是一部对推进新启蒙运动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部力作。作为该书的阶段性成果已有多篇论文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共党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光明日报》等核心报刊上发表，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庞虎硕士研究毕业后，到厦门大学工作，又先后在厦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中国社科院博士后流动工作站从事科研工作，勤奋努力，笔耕不辍，这些成绩的取得是长期钻研的结果，期待他有更多的学术建树，也愿本书的出版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贡献一份力量。

是为序。

陈答才

2018年3月7日

目 录

序	001
绪 论	001
第一章 新启蒙运动概况	011
第一节 新启蒙运动的历史动因	011
第二节 新启蒙运动的发展历程	022
第二章 新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及其中国化转型	031
第一节 新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	031
第二节 新启蒙运动的中国化转型	042
第三节 新启蒙运动对中国化话语的理论升华及机制架构	050
第三章 中国化导向下新启蒙者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 初步建构	067
第一节 新启蒙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	067
第二节 新启蒙者与马克思主义史学革命	105

第四章 救亡启蒙视野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困境与 路径选择	151
第一节 启蒙理论的畸形蜕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同危机...	152
第二节 对“中国”的传统式解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话语的实质蜕变	164
第三节 启蒙过后的中国反思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选择...	175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审视	181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重构	181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践行的“质”、“量”、“度”	195
参考文献	209
后 记	215

绪 论

一、选题缘起

思想文化作为人类进步的阶梯和民族兴旺的主要标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传承和推动作用，它“既是维护社会及整个国家民族团结一致的一种重要社会机制，也是中华民族的崛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种力量源泉”^①。纵观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后来的“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等，每一次重大社会变革无不蕴含着思想启蒙的功绩。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史。

就个案而言，各阶段的启蒙运动又总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存在，一方面，它作为启蒙运动发展历史中的客观一环，不可避免地传承着旧启蒙运动的基本传统，是自古以来中国乃至世界启蒙浪潮的内在延续与惯性发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又根植于特定时期特定场域的客观环境之中，必然地与当时的历史局势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产生密

^①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西出版集团 2007 年版，第 350 页。

切的关联。具体到抗战前后的新启蒙运动,虽然目前学术界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争论,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它“刚发起不久,尚未真正展开,抗日战争就爆发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一个大规模的运动”^①。但这里有两个客观事实必须认清:(1)新启蒙运动(至少当时的倡导者如此称谓)发起于民族救亡形势日趋严峻的抗日战争前夕,不可回避地反映着中国这一客观现实的变化;(2)新启蒙运动是由陈伯达等中共人士发动的,并广泛吸收左翼人士参与的,就不可回避地反映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意识。这就决定了,新启蒙运动绝不仅仅是对旧启蒙精神的恢复与传承,更包含着与抗战新形势、中共新领导以及由此推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的内在关联。这也是本书研究的主要取向。

基于以上认识,并结合当前现实,笔者认为,该研究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理论上,通过本书的研究,有助于全面把握中华民族的抗争历程和启蒙轨迹,厘清民族救亡与思想启蒙的渊源关系,系统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行机制、影响因素、时代特色以及演化规律,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丰富与发展、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构与完善提供必要的理论借鉴。

实践上,通过本书的研究,有利于优化思想启蒙的运行机制,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教训,继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认清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增强与时俱进的使命意识,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转化,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科学航向。

^① 李新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二卷重印说明”。

二、学术史回顾

有关新启蒙运动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抗战期间，伴随着该运动的推进，相关的研究工作便已展开。当时的主要著作有：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简要论述了从戊戌变法以来启蒙运动的发展历程，并详尽论述了新启蒙运动的背景及主要内容。陈唯实的《抗战与新启蒙运动》、《新人生观与新启蒙运动》等著作，主要阐述了抗日战争与新启蒙运动的关系，“九一八”事变后的国难刺激了新启蒙运动，而新启蒙运动又促进了抗日战争走向胜利。万流的《新民主主义的溯源与新启蒙运动的重估》和《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与任务》两篇文章，在阐释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同时，也提及了新启蒙运动的影响价值。还有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陈伯达《真理的追求》等著作，以文集的形式，对新启蒙思想成果进行了初步总结。此时的著述，虽然或多或少地包含了学术研究的成分，但由于当时新启蒙思潮尚在推进或者刚刚落幕，著述的内容还主要体现停留在对该思潮的宣传、汇总、追忆的层面之上，并且基本是由该思潮的直接参加者撰写，还很难保证相关评析的客观中立性。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倡导，学术研究也曾一度活跃，但受到日渐高涨的政治运动的影响，关于新启蒙主题的研究被严重淡化甚至肆意扭曲。1960年，李新等人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初稿)》第二卷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在第三章“华北事变和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涨”中，专门辟有“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涨和文化界的新启蒙运动”一节，引用了发起者陈伯达等人的言论，对新启蒙运动做了描述性介绍。但后来该书重新印刷时，却又删掉了有关新启蒙运动的内容。1971年10月1日，《红旗》第11期还发表了钟慎的文

章《把批判唯心论的斗争进行到底——驳斥刘少奇、陆定一保护和鼓吹唯心论的反动谬论》，指出 20 世纪 30 年代“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提出‘国防哲学’的口号，乞求同反动唯心论组织‘哲学上’的‘联合阵线’，‘共同进行新启蒙运动’”。直到 1978 年初，《社会科学战线》第 1 期还发表了王若水的《“国防哲学”就是投降哲学——评陈伯达的“新启蒙运动”》一文，认为新启蒙运动是投降哲学的表现，“完完全全是适合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需要，适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需要，适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等，表达了对该运动的彻底否定之意。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浪潮解放的不断推进，学术界对新启蒙运动进行了重新认识，研究的内容更加广泛，得出的结论也逐渐趋于正面。1985 年冯契主编的《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包含了对新启蒙运动的词条解释。1987 年陈旭麓主编的《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对新启蒙运动的思想内容进行了详细评析，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国内学者客观解读该运动的最早著作。之后，一些大部头通史类论著例如：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李云峰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史》（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郭绪印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等，都不同程度地介绍了新启蒙运动的大致情况，并基本延续了客观评析的学术立场。一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史论著例如：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 1987 年版）、冯崇义的《国魂，在国难中挣扎——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吴雁南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第 3 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丁守和主编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彭平一的《冲破思想的牢笼：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也收录并论述了该运动的相关史实。一些人物传记例如:叶永烈的《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杨苏的《艾思奇传》(云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等,也开启了新启蒙人物研究的先河。相关的期刊文章也不断涌现,刘晓辰、曹跃明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研究》(《争鸣》1993年第1期)、方敏的《论新启蒙运动》(《中州学刊》1997年第2期)、冯崇义的《论30年代夭折的“新启蒙运动”》(《开放时代》1999年第3期)、俞红的《论新启蒙运动》(《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张光芒的《新启蒙运动与五四启蒙运动比较论》(《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黄一兵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启蒙”思潮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庞虎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启蒙运动夭折的原因分析》(《光明日报》2009年3月3日)等,都是目前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国外学术界也对该主题产生了较高的兴趣,也出现了不少相关著述。美国学者维拉·施瓦支的《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李国英等译),以历史的视角,对“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启蒙运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评析,是目前国内学者关于该主题引用最多的著作。此外,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的《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翁贺凯译)、德国学者罗梅君的《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孙立新译)、韩国学者金良守的《论“民族形式”论争的发端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等,都含有该主题的研究。

但总体来看,学术界的研究虽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研究视角过于单一

当前有关新启蒙运动的研究，主要拘泥于历史的纵向视角，过多从启蒙运动的历史脉络出发，反复论证新启蒙运动对“五四”启蒙精神的恢复与传承，忽略了该运动形成发展的时局性因素、时效性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创新性内涵，特别是忽视了该运动与当时正在勃兴的民族文化复兴思潮、民族形式问题论争、文艺整风运动等历史现象特别是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流意识的内在联系以及在国统区与解放区之间的主题转换和内容发展，没能看到不同历史背景下启蒙运动的变化差异以及特定场景下启蒙运动多层面多维度的复杂本质，从而使得该研究显得过于笼统单一，系统化、整体化的程度还远远不够。

（二）理论深度尚待加强

学术界的研究，主要还集中于对新启蒙运动的发展状况的一般性叙述介绍的层面之上，真正具有研究意义的内容太少，并且，目前研究的内容，还基本上体现在某些通史书稿的个别章节，或者零散地包含在其他主题的著述之中，没有形成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专门性论著。相关史料的欠缺，也加剧了理论创新的不足，一些研究者的观点过多依附和照搬该运动当事人相关著述中的某些思维定式，特别是还没能摆脱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一书的研究框架和思想倾向，还有一些学者仍局限于救亡——启蒙二元对立的理论思维之中，没能超越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的已有观点，在学术内涵的充实、理论价值的提升、现实意义的探索等方面，都有待于大力加强。

（三）学术偏见依然存在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的思想观念已有了较大改善，但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学术偏见仍没有彻底消除，新启蒙者陈伯达等人后来的政治错误，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者对新启蒙运动的研究立场和重视程度。2001年李新、陈铁健主编的新版《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不再提及这场运动。就连2002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70万字权威著作《中国共产党历史》，也只字未提新启蒙运动之事。这一倾向不可避免地给本应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留下了一些遗憾，陈伯达之子陈晓农就曾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一书中感叹道：“因为一个人的倒掉，就把历史的重要一页撕去，这在学术史上是罕见的事”^①。

三、研究思路及创新

基于以上学术史的考察与分析，笔者力图在继承现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针对目前研究的诸多不足，希冀在本书的撰写中实现一定程度的突破。

本书的研究主题，并不仅仅在于新启蒙运动事件本身，也不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解读，而是更侧重于新启蒙运动背后的客观背景、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渊源等。首先，运用历史考证的方法，分析新启蒙运动中国化取向的历史缘由，借以考察该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联的客观必然性；其次，运用理论研究的方法，分析新启蒙运动的思想内涵，借以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知识背景；再次，运用纵横比较的方法，分析新启蒙

^① 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44页。

运动的中国化特色以及抗战后期中国化内涵的实质转向,借以考察新启蒙运动的演变进程以及由此影响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转换;最后,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分析当前新时期思想启蒙的路径取向,借以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内涵。

本书希望能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一些力所能及的创新探索:

(一) 研究视野上:尽量实现全面系统

本书的研究,将紧紧围绕新启蒙运动与中国化的内在联系这一主题,进行历史背景、思想内涵、主题导向、现实启迪等多个方面的研究,力图全面反映各要素间的主题联系,同时关注时间的变化和场域的变迁所引起的运动重心的转向以及中国化内涵的升华,在动态变化中探索思想启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行规律。

(二) 具体内容上:努力提出新见解

本书将简化对“是什么”、“什么样”的描述性介绍,更侧重于“为什么”、“怎么做”等深层次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探索,力求做到史、论结合,提高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并针对目前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力争在救亡与启蒙的关系、新启蒙运动的中国化理论升华及践行机制的建构、新启蒙运动中国化的主题转型、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取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质”、“量”、“度”界定等方面,进行力所能及的探索,提出自己的观点,以引起学术界对该领域研究的充分重视。

(三) 史料运用上:重视原始史料的挖掘

本书将以现有史料集(例如:《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国现代思